

“谦”：中国人的大智慧

□ 马爱菊

中国古人一向推崇“谦”，视“谦”为美德。早在先秦时期，先哲已洞察到“谦”的智慧，《易传·系辞下》说“谦，德之柄也”。“谦”是高尚道德的基础，是文明礼仪的核心。《尚书·大禹谟》载“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意在启示后人过分张扬会招致损失，谦逊则能带来福祉。“谦”不仅是一种个人品质，亦是一种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时至今日，我们日常用语中仍有很多与“谦”有关的词汇，如“谦让”“谦虚”“谦卑”“谦逊”等，很多谦辞被高频使用，如“鄙人”“奉还”“不敢当”等。由此可见，这种源自农耕文明的精神理念，不仅仅是一种礼仪，更是一种深层的存在方式。纵使跨越数千年，“谦”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智慧依然在为现代社会中的交往伦理发挥着巨大功用，润泽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谦”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不争”。《尚书·虞书·尧典》盛赞尧帝“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舜典》称赞舜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如此一來便将“谦德”置于崇高地位。孔子以泰伯为例，同样极力赞赏谦让之美：“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理应继承王位，而太王有意传位给三弟季历之子昌，为了成全父亲，泰伯携二弟仲雍迁居荆蛮句吴，以表示不再继承君位，以此来避让季历。他们不仅放弃了显赫的家族地位，还三次主动让出王位，受到后世敬仰。泰伯的谦让并非软弱，而是更高的智慧，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不仅如此，孔子认为，即使参加竞争性活动，也要做到谦让：“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不争则

意味着对自身利益的主动放弃，并将自身利益让渡给他人，呈现的是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出自人的内心道德自觉，并没有掺杂外界的权力压迫或利益熏染，是儒家君子追求的美好品德。

“谦”的另一个含义是“低调”。传统儒家认为低调是保持美德的关键，也是君子所追求的风尚和品格，《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如果要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如果要登高处，就必须从低处起步。换言之，若要成就一番事业，脚踏实地的同时，还要保持谦逊，唯有低调才是个人成长进步的基石。孔子十分提倡谦，并且身体力行。在学习上，孔子谦虚好学，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还能够做到“子入太庙，每事问”，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虚心向他人请教，且不以询问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为耻。谦虚是一种智慧，持有谦逊态度，虚心接纳批评与建议，承认自身不足的同时，学习他人的长处。对他人保持开放心态，就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如容器一般接纳不同观点完善自我。正如王阳明所说，“谦则虚，虚则无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

对个人修养而言，“谦”是消解“傲”的良方。“谦”的对立面是傲和满，王阳明直言“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与之对立的傲慢则是自我封闭的开始，是失败的前兆。“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在王阳明看来，骄傲和自满害处极大，能够让人走向“不孝”“不忠”“不慈”“不信”的窘境。“谦”是一种智慧，是赢得尊重和成功的关键，“非但是外貌卑逊，须是中心

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人。故为子而谦，斯能孝；为弟而谦，斯能弟；为臣而谦，斯能忠”。真正的谦逊不是外表的低调，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理解，体现在对父母的孝、对兄长的悌、对君主的忠。在现代社会，“谦”依然是个人成长中的重要品质，是助人通向成功的桥梁。唯有保持谦逊和开放，才能不断积累个人的德行和能力，以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

对社会交往而言，“谦”是建立良性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难免被私欲和利益所裹挟，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满足私欲，常会不自觉地陷入竞争漩涡。当利益与欲望交织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充斥着潜在的冲突与对抗。然而，“君子无所争”的大智慧恰恰能缓和恶意争斗，极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谦让的处世哲学，不仅能缓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对立，还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不再是你争我夺，而是相互尊重、彼此成就。这种境界，正是“君子无所争”所昭示的至高境界。

对国家社稷而言，“谦”是守政固国的法宝。当政者谦虚与否关乎国家兴衰，孔子认为：“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能以礼让治国，人们就会避免相互攻伐，人民保持了和睦，社会就会安宁。《国语·晋语》载：“国家之将兴也，君子自以谓不足，其亡也，若有余。”若当政者自足自满，国家就会岌岌可危，因此要做到“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儒家常用“敬器”来劝诫当政者时刻要谦虚。“敬器”的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若其中不盛一点水呈空虚状态，它总是呈倾斜状，人无法端正地放置它，待扶正后，一放手则

又歪斜在一边，即“虚则欹”；若将容器注入一半水，它就可以端正地挺立在那里，即“中则正”；若将容器注满水，它又自动向另一侧翻倒，将水全都倒出来，即“满则覆”。意在时刻警示“满招损，谦受益”，这对任何时代的当政者都颇具深意。

“谦”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谦”不是无原则的放弃、妥协，更不是推卸自身责任。曾国藩曾告诫子女，知进取、晓谦退，懂得适时谦退才可以让人久享。“遇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将“谦”作为美德，并非抑制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而是反对非理性冲动，换言之，“谦”不是不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当面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时，要勇于承担而非退让。“当仁不让于师”常言常新，意为人们应以仁为己任，在实践仁德方面，对老师也不必谦让。谦出于人之真心，真正的谦是心存恭敬，而非外在的、刻意的客套，为礼而礼的谦就是虚伪，自然不能长久。

“谦”是中国人的大智慧，它超越了简单的礼仪，是一种高级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境界，体现了中国人对自我修养、人际关系和家国理想的深刻理解。“谦”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底色，已然成为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印记。



双鉴楼与傅增湘的古籍守护之道

□ 高硕

傅增湘（1872—1949年），字润沅，又字沅叔，别号藏园居士、藏园老人、双鉴楼主人等，四川江安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傅增湘6岁起开始就读私塾，后随父定居天津。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应顺天府乡试，中举。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九年（1903年），被授翰林院编修。三十年（1904年），傅增湘总理天津女学事务。三十一年（1905年），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天津女子公学。三十二年（1906年），在天津创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三十四年（1908年），傅增湘被任命为直隶提学使，兼领京津地区的教育。辛亥革命以后，1917年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躬身于教育实业。1918年，傅增湘于北京西四石老胡同购得一处宅院，命名为“藏园”，除自居以外，亦用于收藏图书。1927年，傅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整编故宫各处所见图书。1929年和1930年，先后两次赴日本访求中国古籍。1930年，傅增湘以“清华导师讲授版本目录校勘”。1941年，傅增湘69岁时，辞谢一切名义任职，决意退休，专意于“文字撰述之事”。1949年，傅增湘病逝于北京西四石老胡同，安葬于西郊福田公墓，享年77岁。

傅增湘出生于藏书世家，从其祖父傅诚开始，就注重搜集古籍善本，到傅增湘晚年时，家中藏书已达20余万卷，版本所及宋元明清，珍本古籍众多，还藏有一些孤本。傅家藏书，最早始于其祖父傅诚所收元代兴文署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这就是后来傅增湘“双鉴楼”藏书之“双鉴”之一。据《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傅增湘1911年在上海购得四库馆当时所进呈之宋刊本《古文集成》，成为其“故意搜求”古籍刊本之始。后来遍交缪荃孙、张元济、沈曾植、杨守敬、莫荣、徐乃昌等著名藏书家，广泛搜集“旧本精槧”。1916年，傅增湘收得端方旧藏宋百衲本《资治通鉴》，与其先祖所收《资治通鉴音注》“后先辉映”，遂题藏书之所曰“双鉴楼”，自述“上以表先人之清德，下以策小子之孟晋焉”。自此，“双鉴楼”藏书名扬全国。关于“双鉴楼”的来历，学界还有另外两种说法。其一，傅增湘曾于1928年购得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于1932年购得南宋淳熙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学界后来遂有传言，以此为新的“双鉴”，取代原来所藏之“双鉴”。其二，传言以后来所购《洪范政鉴》取代《资治通鉴音注》的地位，形成新的“双鉴”。不过，从傅增湘所作相关题记来看，未曾提及以上新鉴取代原有“双鉴”之事。

傅增湘收藏古籍善本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一是继承先祖遗留下来的藏书，“不盈万卷”，其中以兴文署本《资治通鉴音注》最为珍贵。二是走访购买，这是傅增湘收藏古籍最主要的途径。例如，北宋国子监本《周易正义》、南宋内府本《洪范政鉴》、淳熙本《通鉴纪事本末》等，皆是重金购买所得。通过这种方式，傅增湘先后购得盛昱、端方、徐坊、杨氏海源阁、卢氏抱经楼、江阴缪氏、独山莫氏、张之洞等众多藏书家之书。三是友人馈赠，例如1931年张元济赠明弘治本《陈伯玉集》，朱文俊赠宋刊《册府元龟》残本一卷。傅增湘不少古籍，来之于藏书家之间的往来馈赠。四是藏书相易，例如1911年傅增湘以清平山堂本《夷坚志》与缪荃孙所藏《嘉祐集》相互交换，以满足彼此的藏书需求。交换藏书，这也是近代以来很多藏书家交相往来的一种方式。除此以外，傅增湘还通过誊抄、搭印等方式，获得不少古籍善本的副本。

傅增湘收藏古籍，特别注重对古籍的版本鉴定，是近代以来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傅增湘出生于“三世善守”的藏书之家，从小耳濡目染，“多闻博见”，熟知各种古籍版本鉴定方法，可以根据书的纸张、版式、刻工、字体、藏印乃至装帧等特征进行鉴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傅增湘所藏宋版《乐府诗集》，就是根据书籍的装帧、版式等特征作出的准确判断。傅增湘熟悉五代以来各个时代刻本的风格，并对各地刻本的特征及其版本源流非常了解，鉴定版本优劣和真伪，其水平之高，他人难以企及，甚至可以做到“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最能体现傅增湘古籍版本鉴定水平的，是他对陆心源版本鉴定上的纠正。陆心源是清末著名藏书家，以收藏宋版古籍而著称，但他过于执泥宋版，对不少古籍作出了错误判断。原属宋楼所藏很多古籍被陆心源定为宋版，但经傅增湘考订，或断为元刊本，或定为明刊本。例如，陆心源将所藏《论语集注》十卷定为宋版，傅增湘考订为元版；陆心源将所藏《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定为宋版，傅增湘考订为明版。尤为突出的是，傅增湘能发现并纠正陆心源混淆北宋和南宋刻本的错

误。例如，陆心源将所藏《昌黎先生集》10卷定为北宋刊本，傅增湘则考订为南宋孝宗时刊本。傅增湘对古籍版本的鉴定，根植于渊博的学术见识和超越他人的辨识能力，是一流的古籍版本鉴定专家。

傅增湘不仅关注古籍的版本鉴定，更注重对古籍的校勘整理。据《藏园居士六十自述》所说：“余自辛亥解官，始事校讎。”1911年起，傅增湘与各大藏书家广泛交流，开始搜求珍本古籍，校勘工作随之进行。直至1944年，傅增湘中风偏瘫失去自主能力，校勘工作才被迫终止。傅增湘认为，古籍善本具有极高的传世价值，“校其文字异同，以俟来者有朝一日传而广之”。傅增湘校勘古籍，注重“先求善本”，以善本为对校来订正古籍的脱衍讹倒、夺漏误伪。但善本不易一时能得，为了保证校勘质量，傅增湘甚至潜心花费漫长的时间搜集校本。傅增湘在校勘《刘子新论》时，为了能够亲眼看到敦煌写本，或托人借阅何郛威所藏敦煌残卷，或委托王重民从英法拍摄流亡海外的敦煌写本，校勘工作前后历经30年。校勘古籍过程中，傅增湘一丝不苟、严谨认真，逐字逐句进行校勘，精益求精，直至满意为止。对于疑难之处，傅增湘“不欲轻改一字，不敢臆断一词”，始终保持“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谨慎态度。傅增湘长孙傅熹年说，傅增湘“生平藏书二十万卷，其中经过用善本手自校勘的约一万六千卷”。其校勘之勤、成果之多、影响之大，是自清代以来众多校勘学家难以比拟的。

版本鉴定和校勘工作完成以后，傅增湘接着撰写题跋或校记，评定版本优劣和文献价值，并集中编订藏书目录，先后编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1929年）、《双鉴楼藏书记》《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1930年）、《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六卷（1938年）、《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八卷（1943年）、《藏园群书题记三集》（1944年）等书目。经后人傅晋生补编《双鉴楼宋金无秘本书目》四卷，傅熹年补编《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傅熹年编订出版的有《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1983年）、《藏园群书题记》二十卷（1989年）、《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二十三卷（1993年）等重要书录。这些书录虽然属于私家藏书目录，但具有非常高的文献学价值，在近代以来目录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傅增湘晚年，先后两次将包括“双鉴”在内的300多种珍善古籍无偿赠予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辞世后，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将双鉴楼的大量藏书捐赠给国家及其家乡四川。这些珍贵文献如今分别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地，历经岁月更迭，依然完好如初，继续惠泽学界和大众，成为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脉传承
话藏书

（上接1版）

有利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切入整饬作风，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部队好作风好传统逐步回归，强军兴军正能量不断汇聚，但一些不正之风树倒根存，一些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贪念腐腐、正风肃纪仍然任重道远。习主席指出：“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这一重要论述为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指明了方向。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贵在经常、严在法纪。各级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严格按照法治方式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工作做细、做深、做实，才能保持对不正之风的警醒和抵制。

立起根本遵循，把法治思维能力考核贯穿领导干部选用之中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深刻阐明政治建军时代要求，其中之一是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法纪严明。新时代新征程，要推动依法治军战略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拓展，就必须抓紧抓实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这一重要环节，不断激发提高他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问题、推动发展的实际能力，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树立考察识别鲜明导向。军队领导干部是依法治军的中坚力量，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客观所需、职责所系。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无视法律法规，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就会产生脱离官兵、侵犯基层利益负面影响。切实把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

确立这一导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级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能不能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把遵纪守法作为衡量干部德才的标准，把依法行政状况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指标，强力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带头知法、带头用法、带头守法、带头护法。

细化法治思维评价标准。标准清则方向明。考评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必须细化考核标准，使之有据可循。要看是否能自觉学习法规制度，贯彻落实规章制度是否坚定，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否牢固；看思维理念是否更新，能否做到依法分析、依法统筹、依法判断、依法决策；看能力素质整体是否优化，能否做到创新力、执行力不断增强。同时，落实好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把个人述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民意调查等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勤勉之心、慎行之心。

探索能力检验方法路径。考察检验途径是评价法治思维能力强弱的“桥”和“船”，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能对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能力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要坚持在履行岗位职责中检验，看工作思路是否有法可循，指导思想是否有法可依，工作作风是否符合规定；坚持从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检验，看指挥程序是否正确，落实指示是否合规，意志品质是否过硬；坚持从关键时刻表现中检验，看在大是大非面前政治纪律坚守严不严，组织观念强不强，言语行动有没有背离党性原则。同时，多途径、多渠道了解，确保检验结果全面、真实。建立健全干部依法用权档案，加强考察信息综合研判，通过法律知识抽查测试，了解法律素质状况；通过群众检举、反映或开展问卷调查，了解用权状况；通过明察暗访，发现群众反映强烈而平时疏于监督的问题等。

注重依法运用评定结果。切实把评定结果运用到领导干部任免

上、运用到帮助班子解决实际问题、运用到决定领导班子奖惩罚上。对法治思维能力强、工作实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综合素质提高快的干部，及时发现、跟踪培养，大胆使用、委以重任；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思维视野闭塞、精神状态低迷、心浮气躁的干部，进行谈心谈话，限期改正，并下决心推迟晋职或作调整交流；对考核反映问题突出的干部，采取组织手段严肃处理、坚决调整，真正体现“干得好的考得好、考得好的用得好的”。同时，将考察结果运用到探索改进干部选拔任用渠道上，加强考察结果分析，认真总结考察对象的优缺点，有针对性地培养教育；强化考察结果的反馈，既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改进提高，又沟通思想、激发活力、凝聚力量。

健全制度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培塑提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是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积极参与法治实践，自觉把维护法规作为一种责任来履行、把遵守法规作为一种习惯来涵养、把贯彻法规作为一种素养来培塑。

着力丰富学习教育内容。唯有知之深，才能行之切。要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区分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分级分类编印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学习清单。广泛开展尊崇法学法治用法活动，将法治建设融入领导干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提高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的

能力。

注重法治思维实践历练。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是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根本途径。要准确把握军队法治建设的形势要求，积极适应广大官兵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实际，把法律知识和法治思维真正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作决策、开展工作多想一想是否合法、是否可行，多想一想法律依据、法定的程序、违法的后果，自觉当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推动者、守护者。坚持按法规制度正确用权、谨慎用权、干净用权，坚决维护法规制度权威性，强化法规制度执行力，带头把刚性约束落到实处。

加大权力运行监督力度。依法治军的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层级监督、专门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形成经常性、制度化、高效率的监督体系，确保监督成效。严格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坚决落实“法定职责必须为”，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

完善违法问责制度体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是要坚持有权必有责、失责要问责、违法必追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案件，重点查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工程腐败等案件，让违法违纪者付出代价。要加强对行政管理、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领域的执法，实行行政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完善领导干部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违法违规决策导致决策严重失误的，严肃追究主要决策者和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的责任。引导领导干部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带头建设法治、厉行法治、维护法治，引领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

（作者系江西省委常委、省军区少将政治委员）